

社会蓝皮书揭示公民社会的阵痛与自省

已近年终,进入回顾与盘点的时间节点。12月15日下午,2009年《社会蓝皮书》走进公众视野,那些关于中国社会形势的报告,也将这一年太多的艰难、感动与收获,在不断地回放中一次次定格。

极不平凡的2008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被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而发生于这一年里的太多事情,将对未来中国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之进行盘点与回顾,最大的价值落脚点,就是催发我们不断地从教训中自省,引领我们走向更加民主、文明、法治的公民社会。

诚如2009年《社会蓝皮书》主报告李培林介绍,今年比较明显的新现象就是公民社会发展很快,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很显然,公民精神在去年的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事件中已得到极大凸显,这也是我

们走向公民社会的精神驱动。但是,这一年的中国社会,又让公众看到太多因素的大起大落,一些公共危机事件仍然带给公众极大的伤痛,特别是发端于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带给公众极大的茫然与惊悚。从美国华尔街掀起的金融海啸,也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民生苦难与艰涩。

这一切,都寓示着,在走向公民社会的征途中,我们收获过喜悦,同样也遭遇着强大的阵痛。前几年学者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之说,曾受到决策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强大的关注。社会发展必然会面临种种利益分歧和对立,在有些领域形成一定的断裂。种种现象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仍将面临种种矛盾、利益冲突与利益博弈。要想真正消解那些位于断裂带上的冲突和矛盾,就必须通过理

性的回顾,来正视客观存在的问题。对2009年《社会蓝皮书》最好的解读,就是使之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制度蓝本,来弥合其中存在的断裂,让我们在将来不再去承载那些不堪的阵痛。

这就是关注与解读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价值意义。其实,在与之相关的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中,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经济陷于低迷之下蕴藏着失业、社保、治安等严峻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加,更多的人也越来越懂得选择以客观理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现实。作为这一年中国社会的重要蓝本,2009年《社会蓝皮书》本身没有陷于虚荣的幻象中,现在,对它进行解读与阐释,同样也应该走出拘谨,通过仔细触碰那些断裂处那怕是令人心悸的伤痕,来进行自省

与反思,来寻求有效的制度弥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拥有真正足够的自信与坦荡,来让公众在未来免于承受类似的阵痛。

深厚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需要客观的理性与舒展的魂魄来进行解读,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需要。大国行思,致以致远。回眸2008年中国社会,重新把记忆和镌刻的落脚点定格于那些深深断裂处,再次从那些不堪的伤痛中进行责任反思,我们才能在国内外各种经济文化洪流中,不会沉浸于炫目的荣耀之中而迷失了方向。也只有直面现实,对转型期中国社会进行深刻的解剖,寻找到所需的规则健全、制度公正与秩序完善,最终,才能为真正走向公民社会构建起科学的“制度蓝本”。 单士兵

究竟是谁对不起农民工

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说:“我们现在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却把农民工都赶回了家,我们都对不起农民工。”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们第一个功臣就是农民工,我们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但是我们中国刚刚得到发展的时候,就把这些农民工赶走保证这个地方的人口素质,简直是荒唐。”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政府高官对农民工最中肯的评价。

然而,究竟是谁对不起农民工?

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就业促进法》更是将就业前培训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详细地罗列。所以,农民工就业之前或者暂时失去就业岗位之后,当地政府应当承担就业培训的责任,让农民工通过岗位技能训练,从而顺利地找到工作。可是,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打着产业结构调整幌子的幌子,千方百计地将农民工驱赶回家。这种公然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可持续发展。如果把农民工赶回家乡,而不是就地地进行技能培训,并且重新安排工作,那么,就是将东部沿海地区力量中出现的过剩,转嫁给中西部地区;就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忘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责任。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才的竞争。建立人才培训网络,使企业的员工不断地适应市场变化需求,既是企业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企业员工的素质不断提高。在解决他们生存问题的同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择业条件。

人们注意到,这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存在明显的问题,不少地方在高等院校改革的过程中,将从事岗位培训的职业院校市场化,从而使农民工望而却步。在这些地区,从事高端培训的市场异常火爆,可是类似于职工夜校或者技工学校的政府培训机构却日渐萎缩。这说明当地政府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正在放弃自己的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在加大《就业促进法》实施检查力度的基础上,督促东部沿海地区政府部门,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从而使农民工在接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重新找到工作岗位。 乔新生

通货紧缩即将袭来吗

然,PPI的数据急跌,毕竟意味着市场需求下降、供过于求问题严重,不可低估。

PPI快速回落还可能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关。如国际原油价格7月份达到147美元/桶,而现在则只有40美元左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一方面是整个世界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开始转向衰退,从而使对许多商品的需求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是美元汇率由7月份之前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快速贬值,而突然快速升值,导致整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体系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从而使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减轻,PPI全面下跌。

再看CPI。这一指标也出现连续几个月快速下跌。而CPI下跌主要是食品

类及居住类下跌比较快。对于食品的价格下跌,一定程度在于国家扶持农业生产,增加供给及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居住类价格的下跌,它显示了房地产价格下跌正逐渐反映于CPI。

应该看到,上一轮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价格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及全球流动性泛滥。当前两个因素改变了,特别是全球流动性由泛滥到收缩,更加剧了物价下跌。如2007年以来货币政策对物价累积影响开始显现。所以当前CPI下跌也本该是市场可预料的。

但是,就此来说,中国2009年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并不可贸然断定。因为,尽

管当前这种经济态势可能再持续几个月,但随着政府扩大内需政策落实,政府加大了财政方面的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可能会在3-5个月内有所恢复。到时,物价又会出现新态势。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宽松,银行利率下降到历史低点,大量货币又会流出银行体系。当市场出现大量的流动性时,无论是资产的价格与物价水平都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不是通货紧缩。所以,央行在第三季度报告中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在防止通货紧缩,长期则在防止通货膨胀。这判断是有道理的。

当然,CPI回落也为保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它不仅有利于民生,而且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比如说,农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原油价格及矿产资源的价格等,都是理顺价格机制的极好机会。这样不仅能够减少CPI的下行机会,也可对国内不少要素价格进行改革与调整。 易宪容

中西部可建新经济特区 让经济均衡发展

目前,中国采取一系列财税和货币政策拉动内需,目的是为了保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在采取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应配合运用区域政策,这样宏观政策效果更好,其中一个思路是能否考虑在中西部建立新经济特区。

在中西部建立新经济特区,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通过在中西部建立新经济特区,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国家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除要落在具体产业、具体项目上,还要具体落在具体区域支撑点上。在中西部建立新经济特区可以使国家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区域支撑点,形成经济发展的聚集作用,从而有助扩大内需,使国家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产生更大的力度。建立新经济特区,需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建设,能创造出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无论对外资还是对内资都是一块“新蛋糕”,这些私人资本不会错过机会,自然会在新区投资扩大投资。其次,建立新经济特区的目的是逐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使中西部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达到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再次,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经济特区的经验教训为建立新经济特区提供了指导,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新经济特区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外,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2007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地区。

有人会说,现在提建立新经济特区是不是过时了?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经济特区主要是为了促进改革开放,现在还有必要建立新经济特区吗?其实,在现阶段建立新经济特区仍有必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还远没结束,后面的路还长,建立经济特区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置,中国的改革开放还需要这样一种制度设置继续发挥作用。而且,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保留并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特区。

为什么说这是新经济特区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与原来的经济特区区别开来。新经济特区突出一个“新”字,也是为了说明这是在新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建立的经济特区。第二,起点不一样,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力、财力、开放程度与以前已大不相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立的经济特区是不同的。第三,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不一样,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为了建立试验区。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原来的经济特区立足向外,新经济特区既要面向国外,又要立足国内。第四,经济特区运行模式需要创新。

在中西部建立新经济特区,首先要定数量,即需要建立几个新经济特区。新经济特区数量多了,经济聚集作用不大,如果数量不够,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又不大。建议在中西部和西部各建四个新经济特区。其次,选城市,主要考虑候选城市的地域特征、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宜选择目前已有较大规模且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因为这类城市无需通过建立新经济特区发展经济,应选择规模及发展水平中等的城市。再次,确定特定政策。没有特定政策,新经济特区就不能称为特区了。以前四个经济特区主要依靠特殊优惠政策,目前主要依靠特殊的区域投资、区域资本以及转移支付政策等等。最后,确定产业结构。原四个经济特区建立初期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特区除了应继续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外,同时还应大力发展航天工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任寿根



扩大内需,抓住了经济增长的“牛鼻子”。 宋学海



某市将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公务员出差乘坐航班,以刺激长期低迷的航空业。 李嘉

不能让“软腐败”官员逍遥法外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网友进行一番肉搜索后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至尊”香烟,每盒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网友纷纷质疑:“一位局长,能抽这么高档的香烟吗?”(12月16日《成都晚报》报道)

早在2006年,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某卷烟厂的一块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受到的人们的热议;而现在,也正好有南京的官员在享受着“厅局级的享受”,这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尽管这个房产局局长“天价香烟”事件并没有得到最终证实,但是,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个局长抽“天价香烟”的真实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官员抽高档烟、喝高档

酒、住高档酒店等实在是大正常了。对于不少官员们抽的高档香烟,喝的高档酒,住的高档酒店等,是不是一种腐败?当然是一种腐败,而这种腐败和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等“硬腐败”有所不同,是一种“软腐败”：利用职权,吃喝玩乐等。而目前这种“软腐败”已经逐渐走向公开化、并有被披上合法外衣的危险:一是不少官员都承认,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不算是腐败;二是公众好像对官员各种“软腐败”熟视无睹,并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可态度;三是司法等部门对官员种种“软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数“软腐败”得不到应有的查处。

对于官员各种吃喝玩乐“软腐败”,没有人怀疑这是一种权力腐败。正是由于官员手中的权力,才有人主动给官员奉送上“天价香烟”,才有人主动宴请官员喝高档酒、住高档酒店、

玩高档娱乐场所;也正是由于官员手中权力,大笔一挥,可以用公款买“天价香烟”、喝高档酒、住高档酒店、玩高档娱乐场所等。官员“软腐败”的实质还是权力腐败,而“软腐败”的背后,必然是法律受伤,必然是公共利益受损,必然是政府形象被打折扣。

由于认识上存在着误区,法律上存在着漏洞,官员“软腐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查处。也正是由于这样,官员“软腐败”才会越演越烈,甚至已经走上了公开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软腐败”不仅造成了大量公共财政的浪费,败坏了政府形象,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还是目前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区域,对此,放任“软腐败”横行,最终必然祸国殃民。当务之急是,有必要将官员各种“软腐败”上升到问责高度,不能再让“软腐败”官员逍遥法外,越行越远。 徐经胜

“学术包工头”:考问一下自己的良知

12月15日《齐鲁晚报》报道,在日前召开的山东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论坛上,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当众痛斥目前存在于高校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齐涛说,学术从业人更世俗化,追逐职务、金钱、荣誉、地位,当“包工头”的现象屡见不鲜,真正能把学术当成事业,“板凳坐穿十年冷”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以学术为目的的人就少了,更多的人只是把学术当做谋生的手段。

其实,这样的批评我们并不陌生。从导师到老板,从老板再到“学术包工头”,这些称谓在高校里的流行,透露的不仅仅是师生关系的变化,更是某些高校从学术化向世俗化,从世俗化到庸俗化的堕落。

曾几何时,高校里师生间促膝交谈、并肩攻关的情景如今已不再,当师生间“授”与“学”关系异化为老板与员

工的雇佣关系时,我们曾将根本原因归结为利益驱使——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便完成论文和获取学位,他们并不在意导师能否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至于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长为怎样的人,他们也并不在意。

从这个角度来说,导师蜕变为“学术包工头”,是学术腐败的一种形式,导师与研究生之间雇佣规则流行,也可以看做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寻租”。对此,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有过广泛的议论和批评,但情况并未见好转。

那么,针对高校里“学术包工头”蔓延的现象,我们是否应该把板子都打在学术从业者身上?学术从业人员世俗化,追逐职务、金钱、荣誉、地位,固然斯文扫地,但我们不妨把视线放

得更远一些,看看这些学术从业人员所处的大环境如何。

大学本应是追求高深学问的场所,理应具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气质。但现实中,一些大学泛“行政化”趋势渐浓,学术日渐成为一些人晋升的工具,大学里庞大的行政机构体系,使大学从业者的眼光和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同时,一些大学里浮躁的环境,也让一些学者难以沉下心来,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赚钱、出名。

当某些高校自身开始世俗化时,单纯地抨击学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批评学术从业者蜕变成“学术包工头”时,也必须正视一些高校日渐庸俗化的现实,并拿出根治病症的良方。话说回来,不管大环境如何,“学术包工头”们都有必要先考问一下自己的良知。 陈方

当山寨文化的魔力上了身

有位老孟要组织“山寨春晚”,关注的人很多。12月15日《潇湘晨报》发表杨涛的文章《山寨版春晚应该超越什么》,作者给出了许多建议,希望“山寨春晚”能超越央视春晚。

我只是举这篇文章为例,“山寨文化”现象的讨论当然还有很多,大抵是在草根、民间与冒仿、翻版的两类蕴含之间做价值判断。但是,如果稍微追溯一下,“山寨”又无非是一个语词,源于方言,如今又将一些相干的、不相干的,以前的、现在的诸多事情涵括在一起,并放置于上述的两类蕴含之间,似乎“山寨文化现象”陡然出现了。

这个文化现象,不如说是语言现象。一种语词的扩散,让旧事物得到新审视,不可归类的可以归类,不相干的变得相干。我们往更远处回溯,符合“山寨文化”范畴的人、事、物,莫非还少了?这类所谓草根的或者冒仿的人、事、物可以找出很多,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划分方式,还可以列为“名称戏仿型”、“品牌幻觉型”、“指称混淆型”……

新兴语言现象的出现,往往也让价值表述有了新的坐标。以前有地方政府大修办公大楼,貌似白宫,但当时大家只是讨论权力如何在挥霍。而在“山寨文化”的语境下,“乡下白宫”变身“山寨白宫”,权力挥霍在冒仿的层面又递进了,也有了新的喻指。更重要的是,原来本不相关的事情,在新的价值坐标下也就有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春晚、“白宫”可以归并在一起,成就全新的解读。

在很多领域中,一些所谓新兴现象可能并非新出现的,而只是因为语言有了新的用法或者新的意味,从而以新的方式、新的视角来重新整合一些事物。“山寨手机”不过是个引子,而“山寨”一词频频出现后,也开始从戏谑走向正经,从感性走向理性,从个人领神会的意思走向学术性的、确证的意思,新的语词从而可供那些义正辞严的、宏大叙事的评判与分析。

一些学院派通过提概念的娴熟能力,将大家原本熟悉的事物变成概念的表述,其面目也就变得可敬起来。“山寨”冠名的东西也是这样,它让旧事物有了“新生事物”的外衣,其面目也变得可敬起来。“山寨春晚”、“山寨讲坛”等等来自民间的草莽做法,以及“山寨”的方言或者草根的用语,如今在“官方”引用与关注下,其面目愈加变得可敬,意义也更加丰富了。 肖畅

为何总有流里流气的公务员

近日,浙江台州市路桥区地税局以“作为国家公务员,在公众场所存在不检点行为”,对此前涉嫌“猥亵”12岁女孩的该局干部皮宗其做出“行政记过”处分的决定。(12月14日《东方早报》)

此前,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也曾因在酒楼发生类似不检点行为,被免去党内外职务。奇怪的是,据媒体调查,两位涉案人都年过半百,平日在同事中均获不错的口碑,但在“8小时之外”面对普通民众时,却立马呈现出另一副流里流气、江湖味十足的面孔。这种被官方斥之为“组织面前一个样子,远离组织就是另一个样子的双重人格”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某些平时正经八百的国家工作人员,却在变成流里流气、欺幼调良的“混混”,背后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和手上,公权力的定性、边界与运行规则并不准确和清晰。试想一下,在“什么是公权力、公权力从何而来、手中的公权力有多大、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才能动用公权力”等问题之中,只要对其中之一有清楚的认知和遵守,就不至于做出对陌生女童随便“拍肩、摸肩”这般普通民众即使烂醉如泥时亦不敢做的荒唐事,更不至于在坊间留下“我是北京派来的”、“你们这些人算个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之类的“江湖语录”。

明里的生活不检点,通常是由于暗里如此已成习惯。由于对公权力认知不清,某些公务员极易将其异化为私人持有物,既手中权力操之在我、公私难分,那么就能延伸至下班后、转战到饭桌上甚至娱乐场所。习惯成自然,某些公务员在娱乐场所浸淫日久、沾染日多,做戏日熟,难免“直将酒楼作青楼”,有意无意之间,竟把“随便动手脚”的恶习带入酒楼、咖啡店。

从根本上改变某些公务员流里流气的面貌,必须彻底结束其手中公权力不清不白的状态。为此,一靠界定每一份公权力的性质、边界和运行规则,挤压权力可能寻租的模糊空间,使公权力无法成为掌权者随心所欲的工具,逐步使“处理公事到办公室”、“下娱乐场所无助于办公事”成为共识。二靠广泛而自由的监督。不必采用在官员家庭里安排“孩子、配偶作廉政眼线”的那种办法,而是真正落实规定,放开和鼓励社会各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督,使民众不仅能看清一个官员手中到底有什么权力,还能明白地掌握该权力每一次运行的来龙去脉,使某些公务员的“第二重人格”无处遁形。 江渚上